

全球主义的进路与反思^{*}

刘贞晔^{**}

【内容提要】 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既有古老的政治思想渊源，也有着当代崭新的思想内涵。但在全球主义的发展和运用中，其内涵具有丰富性的同时也呈现出歧义而多面的特征。如果对全球主义进行梳理和概括，至少有这样几个面向：作为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作为市场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以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安全为中心的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法律所编织的全球规范网络的全球主义；作为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立场和利益表达的全球主义；作为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的全球主义；新科技革命视角的技术全球主义；作为对发达世界所把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予以批评和变革的全球主义。当代全球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以来，经历了从全球意识到全球治理实践的蓬勃发展历程，当前，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实践正面临巨大波折，全球主义也在各种民粹主义泛滥、反全球化呼声不断和去全球化政策频出的夹击中暂时进入低潮。反思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及未来出路，我们对全球主义的价值和治理功能保持理性的认知：一是全球主义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也决不应该否认全球主义在人类共同应对和解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21&ZD173）的成果之一。

**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决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中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在全球主义占有道德制高点的议题领域，人类对于任何全球主义治理的“庞大社会工程”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审慎。在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走向衰落的同时，全球主义有必要重置其价值根基以超越长期以来其所内嵌的“西方之思”；在国家主义日益勃兴的时代，如何与国家主义相调适将决定全球主义未来的存在和发展。

【关键词】 全球主义 全球化 全球治理 全球问题 全球主义反思

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既有古老的政治思想渊源，也有着当代崭新的思想内涵。当代全球主义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环保主义的政治觉醒之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迅速地由一种政治意识转变为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主义治理实践。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里，全球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还是治理实践，在现实政治中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在这种新的挑战面前，全球主义究竟走向何处？本文拟从全球主义的内涵和思想源流的梳理入手，通过考察当代全球主义从全球意识到全球主义治理实践的发展历程，思考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主义在一路狂飙突进的发展中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启示。

一 全球主义的内涵及其思想源流

全球主义概念的内涵有歧义而多面，本文主要从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与全球治理的角度，关注其中几个主要侧面。如果对全球主义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概括，至少有这样几个面向：^①

一是作为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从古希腊斯多葛派提出世界主义理念开始，超越国家和地域身份局限的个体权利的价值主张和对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就具有了全球主义的初始形态，到后来康德提出世界民主联邦和永久和平的理想设计，再到国际政治实践中威尔逊主义提出的建立超国家机构——国际联盟

^① 关于全球主义的兴起及其源流的考察全面且权威的分析，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本文关于全球主义内涵及其思想源流的梳理主要是对蔡拓教授观点的补充性阐发。

以维持世界和平的主张，一直到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各种规范理论学说，如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价值，各种各样的全球正义理论以及全球宗教界倡议的全球普遍伦理，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的解放等，都属于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范畴。

二是作为市场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这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他们倡导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市场自由放任、放松管制和减少政府干预。有些时候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寻求最佳投资场所引发的关注更为亮眼，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本的全球主义或者跨国公司全球主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说的全球主义，特别是经济生活领域的全球主义就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和全球市场自由主义。

三是以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安全为中心的全球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的凸显和核武器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日益加剧，以及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人们对这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日益重视，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种新的以地球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全球意识和以人类安全为中心的全球整体观，塑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全球主义。

四是作为一种制度和法律所编织的全球规范网络的全球主义。在当前全球治理的所有议题领域，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全球金融与贸易、气候变化与臭氧层破坏的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极地与太空治理等，都能够看到显性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机构，或者无形的原则、规则和规范网络等。这些由制度和法律所编织的全球规范网络构成了约束或者导引国家治理行为的指针，引导着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的偏好，走向以全球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治理行动。

五是作为现实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立场和利益表达的全球主义。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全球主义既可能是各种利益主张者，如资本力量、劳工阶层、各种行业和职业群体甚至是政党和政治组织追求自我利益而进行的跨国联结和利益表达，也可能是一些特定利益和价值观追求者（如环保组织、反核与和平运动、人权与人道主义倡导者、女性权利运动、少数者权利主张者甚至是极端组织）表达利益和发起行动的方式，还可能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看作资本主义

进行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①

六是作为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的全球主义。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最早兴起于 19 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和各种新技术的问世，世界各大洲之间商业贸易和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人类生活中的各项公共事务，如邮政、电信、度量衡等领域的服务需求日益跨越国界，迫切需要跨越国界的服务和管理，于是像国际电报联盟（1865 年成立）、万国邮政联盟（1874 年成立）、国际计量组织（1875 年成立）等在各个领域逐渐成立，此后在卫生、农业、关税、铁路、航空、商标、专利权、著作权等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行政联盟，提供跨国的服务和管理。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成立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将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推向了顶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将超国家主义治理拓展到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再加上联合国体系之外成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各个领域开展的治理活动，使得超国家主义和超国家治理成为当今全球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近年来，随着对超国家机构治理弊病的批评越来越多，各种超国家治理机构也开启了新的全球治理变革议程，如世界银行提出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倡议与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提出的全球公私伙伴关系计划，全球层面多部门（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系统性反馈与联合决策尝试，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G20）的统筹协调能力，等等。^②

七是新科技革命视角的技术全球主义。早在 21 世纪初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论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给全球相互依赖带来的影响时，就提出了基于信息全球化革命而出现的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形态问题。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在科技和通信领域取得了如闪电般的迅速进步，使得“全球化滑入飞行的时代”，个人电脑、视窗操作系统、万维网、开源代码和各种电子联络

① 关于全球主义者的各种政治立场和利益表达的面向的确复杂多样，远不止本文列举的几个方面。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会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和领域概括出不同主题面向的全球主义，如涉及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展时有学者提出“帝国全球主义”（Imperial Globalism），还有指涉全球左翼社会运动主张的“正义全球主义”（Justice Globalism），甚至涉及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的研究时有学者提出“圣战全球主义”（Jihadist Globalism）等。参见 Manfred B. Steger, *Globalisms: The Great Ideological Struggl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② Klaus Schwab, “A 5-point Plan for A New Globalism”, <https://fortune.com/2013/01/30/a-5-point-plan-for-a-new-globalism/>.

方式等,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世界正在被抹平”!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技术、下一代通信网络(5G/6G)、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让当前的世界经历颠覆性技术变革,一种技术全球主义跃然而现。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信息化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全球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国家科技政策之争就开始出现了,技术民族主义者主张保护和补贴,而技术全球主义者则主张技术的全球融合与竞争。当前作为一种思潮的技术全球主义认为新科技革命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人和物空前地连接在一起,“地球村”的理想在技术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世界各国应该从全人类共享科技发展成果的角度考虑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统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充分利用、全球技术产品生产与共享机会(消除技术鸿沟)问题,最终期望一种人类共享技术进步成果的全球技术共同体的到来。

八是作为对发达世界所把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予以批评和变革的全球主义。这种全球主义既包含了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等对发达世界所把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批评,也包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以“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推进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等政治经济诉求。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世界掀起了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使得发展中世界日渐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和生产性需求的核心区。^①于是发展中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片面地强调自身经济独立地位的要求,也不再单调地将自身看作世界经济体系的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而是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并依托自身的发展能力提出塑造和变革全球化的新主张。发展中国家对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各种不同的新主张、新方案逐渐汇聚成了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新全球主义。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倡导世界开放经济,成立新开发金融机构,发起“一带一路”等新南南合作倡议,推动构建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这些以发展为核心的倡议和行动生动地诠释了发展中世界所主张的发展主义内涵和诉求,为发展中世界唱主角的新全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方向。

由上可见,全球主义的概念的确是有歧义而多面的,从整体上全面概括全球

^① 刘贞晔:《全球大变局:中国的方位与出路》,《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主义的所有方面是困难的，但事实上，在现实中不同学科也只关注全球主义的某一个侧面。因此，本文的重点还是把全球主义看作与片面地以民族国家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取向相对应的，超越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局限，以人类共享安全与福祉为中心的一种全球意识、价值主张和行为规范。^①这种全球主义的意识观念和价值主张并不排除世界各国及政府的官方立场和观点，但是它更为典型地体现在以全球绿色运动、全球绿党为代表的众多以全人类整体利益和价值为宗旨的各类组织的政治主张中，同时它也远远超出了全球生态绿色运动的范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人类活动的全球化领域，都显现出与片面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具有的显著张力。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卷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空间，全球主义所内含的全球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已不只是一种价值主张和行为导引，还更具体地化为复杂稠密的国际法律和规范网络，而且在当今国际政治生活中落实为如全球碳减排、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更具体的责任和行动。因此，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意识、观念和价值，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同时还更具体化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系列国际行为和治理实践。

考察全球主义的思想缘起，从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中我们也能找到它的一些踪迹，比如古希腊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思想中，其宇宙整体观、世界公民观就包含了这样一种超越城邦局限，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更好的城邦生活的观念，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思考全球主义的思想背景。再比如世界帝国理念，无论是但丁的世界帝国论，还是罗马万民法，实际都有一种倾向，就是贬低城邦和单个具体国家的局限，将一种世界国家看作解决现实政治纷争的一种理想范式。再晚近一点关于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更是成为当今全球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如圣—皮埃尔的欧洲永久和平计划书，卢梭提出的欧洲邦联思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这样一种理想的政治设计，成为后来国际社会缔造世界和平、构建超国家治理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来源。

在现当代思想史上，我们更能够发现全球主义比较完整的呈现：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伟大思想之中，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市场观念和阶级观念等，都不是以国家为单元，而是以世界为单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人类解放，也是以人类为整体的解放观念。

^① 请同时参阅蔡拓教授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两篇文章中对全球主义更为权威的界定。

其次是全球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体现。威尔逊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国际联盟的建立,都将全球层面建立一种永久和平机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政治安排,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思路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等一系列超国家机构的设计。再次是在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某些个别主张也具有些许以全球整体为思想范畴的观念,比如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大陆腹地论以及斯比格曼的“边缘地带说”等,都不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最后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理论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甚至包括相互依存理论等,它们在经济领域的视野基本上都是以世界为单元,虽然在具体的理论分析中不可避免地以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但其理论视野都是覆盖到全球,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和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在今天,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发展正面临巨大波折与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掀起贸易战和科技战,支撑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制因美国的阻挠陷于停摆。在政治思潮的发展上,近年来各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排外主义思潮泛滥,再加上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的推波助澜,各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现象不断上演,反全球主义大有来临之势。中美两个主要大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考量对全球相互依赖与合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再加上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升级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经济全球化面临被割裂的风险。一时间,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向何处去成了很多人的重大疑问。事实上,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发展扎根于人类技术进步产生的协调和管理相互关系的需要,产生于国家间经济交往的相互需要,产生于资本和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只要人类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经贸往来仍在发展,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发展就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力。即使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战争打断过,但是战后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仍然在技术、市场和经贸需求的推动下再次发展起来。况且在今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在向深度发展,数字科技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仍在深化。全球发展中世界在新世纪里的新一轮工业化方兴未艾,市场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经贸往来的需求仍然强劲,部分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政策对全球化的阻碍仍然有限,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将会借助新科技革命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工业化的发展而获得新的形式和内容。

二 全球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从全球意识到全球治理实践

谈到当代全球主义的兴起，就要与人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全球意识觉醒及其付诸实践相关联，或者说，当代全球主义崛起与发展，就是从一种全球意识走向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进程。历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当前的全球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非常典型的实践性。当然，作为一种思潮，全球主义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存在，往往随着现实实践的发展，使得作为思潮的全球主义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与现实的全球治理实践的距离感。在 20 世纪中期，随着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意识的兴起，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潮和价值，在理论界和国际政治生活中逐渐得到重视。它的思想先声是 1962 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影响久远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描绘了农业领域的工业化特别是杀虫剂的滥用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灭绝，最终有一天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物种都消失了，“我们存在于一个静悄悄的世界”。^① 这部著作在整个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影响都非常大，其中所蕴含的全球意识，从那个时期开始就被迅速点燃并传遍全球。

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上升到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并被树立为合法性不可挑战的一种价值观念与理论范式，肇始于 1972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峰会（也称斯德哥尔摩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而且是以联合国这样的一种全球性机构召集，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环境问题的国际环境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明确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为后代人的环境生态留足空间。这次会议提出了人类与环境关系的 7 个共识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 26 个共同原则。^② 今天来看，这 7 个共识和

^①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2.

^② 1972 年 6 月 5—16 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突出阐明了以下 7 个共识：科技赋予人类改造和利用环境的前所未有的能力；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共同责任；人类对环境的改造既能够造福人类也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环境问题；如果不采取适当政策和措施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就必然会给保护环境带来问题；必须更审慎地考虑人类活动的环境后果；无论人民和团体还是企业和各级政府机关都应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在这些共识的指引下，宣言就人的权利、发展与环境、陆地和海洋生物资源和生态保护等领域提出了 26 条原则和信念，用以指引和提升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环境意识。

26个共同原则，仍然处于国际政治特别是全球治理舞台上的焦点领域。斯德哥尔摩会议对人类环境观念的影响非常大，世界各国在会议之前设有环境保护部门的国家仅有10个，会议结束10年之后已有110个国家设立了环境保护部或环保局。在国际层面，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决议，联合国随后成立了环境规划署，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环境合作提供政策指导，审查联合国各部门实施的环境项目，评估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政策的影响，促进环境科技情报的交流。这次会议大大激发了环境保护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扩散，环境运动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在这次会议之后20年里所缔结的国际环境条约几乎都与人类环境会议存在某种联系。

与此同时，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的前夕，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英国经济学家沃德等人专门为这次联合国环境大会撰写了一个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星球的关怀和维护》。这个报告以翔实的数据阐明了环境污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于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在全球主义思潮的确立过程中真正产生巨大的持久性影响，如果我们把它确定为一个里程碑式影响的话，就一定非《增长的极限》^② 莫属了。《增长的极限》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的首份报告，报告运用人口、资本、粮食、资源、环境污染五个方面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全球均衡模型，提出了“地球承载力是有限的”“均衡状态中的增长”“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等著名理念，随后罗马俱乐部的主要代表人物还在世界各地演讲中提出了“双零增长”，即人口零增长、经济零增长，一时成为全球意识的标志性口号，在全球确立了人口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与地球环境可承载力之间应保持平衡的道德制高点。

在人类环境会议和罗马俱乐部的倡导下，全球主义的意识和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持续的阐发，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1980年出版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就呼吁研究自然生态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全球的可持续

① Barbara Ward and René Dubos, *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New York: Norton, 1972.

②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李涛、王志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续发展”理念^①。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②这至今仍然是对可持续发展最经典的定义。这一概念后来被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接受，成为推动全球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引。至此，我们可以说全球意识已经从一个简单的概念和词语，变成了一种价值主张、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

20世纪90年代召开的里约地球峰会，则是全球主义由意识观念走向治理实践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宪章》）和《21世纪行动议程》，154个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48个国家签署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还通过了有关森林保护的非法性文件《关于森林问题的政府声明》等一系列文件。这些宣言和文件不只是宣扬全球意识，更是吹响了将全球主义意识付诸实践和行动的号角。在这次地球峰会上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一系列全球主义行动纲领落地细化，之后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全球治理行动进入了国际社会的实践议程。比如1997年旨在落实全球气候治理的《京都议定书》得以签署，开始在全球层面分摊减排责任，2000年的千年首脑峰会确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含了八大目标，^③并对这八大目标的实现列出了具体的目标数据，要求各个国家结合《21世纪行动议程》，确立自己的实现目标，制定实施方案甚至是年度计划，来确保全球主义的发展议程得到贯彻落实。

21世纪以后，全球主义的治理实践面临的新问题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比如恐怖主义、贸易摩擦与不平衡、SARS病毒、印度洋海啸、核扩散、

^① IUCN, UNEP, WWF, eds.,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Liv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80.

^②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③ 2000年9月6日至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Summit），会上确立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共有8个方面，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对抗艾滋病病毒以及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建立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索马里海盗、碳减排落地等成为全球主义治理实践的焦点。在上述全球性问题中,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防止核扩散、挽救次贷危机和扭转贸易不平衡等,都是全球治理中的“大”问题,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都难堪重任,需要主权国家甚至是主要大国承担起治理的责任,主权国家的角色特别是主要大国的作用凸显,全球主义治理开始向大国治理靠拢。2008年以后,全球主义治理的焦点进一步转向了大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主权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以及地区热点,也包括全球性问题的压力,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碳减排的压力。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国家内部的治理失效与冲突、伊斯兰国的兴起与覆灭等凸显了国家治理的负外部性日益成为全球主义治理的焦点议题;金融危机催生 G20 新治理机制、IMF 改革,促进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达成等凸显大国在全球性治理难题中的核心角色;埃博拉病毒传播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揭示了全球性问题治理的极端复杂性;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以及俄乌冲突升级引发的西方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等,给全球主义及其治理实践的向前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难题。

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伊始,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受到削弱,中美等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全球主义治理的超国家路径遭遇挫折,大国合作治理的基础遭受侵蚀。同时,全球化与全球主义还面临着像华尔街运动和民粹主义泛滥等来自底层的质疑和抵制,全球主义的治理实践不得不在超国家治理的退缩和国家主义治理强势冲击的狭窄通道中艰难前行。与此相对应,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政治思潮,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和价值主张也不得不在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冲击下迂回坚守,并致力于寻求新的定位,甚至不得不借助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的国家主义治理优势(如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浪潮),去拓展新的治理实践空间(如“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新发展融资等)。^①

总之,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理念,可能会随着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遇到各种其他思潮理念的挑战和竞争。同时,全球主义治理实践所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却仍然客观存在,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多,甚至更具有挑战性。回

^① 外交学院王帆教授认为中国在全球化转型的新形势下可以分别采取责任共担、创立新机制、惠及人和兼济天下等不同战略积极推进全球化转型。参见王帆:《责任转移视域下的全球化转型与中国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顾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历史，我们仍然会发现，国家中心主义的手段不足以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难题，全球主义仍是不可替代的思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路。问题存在之处可能是：我们或者是过分高估了全球主义治理的功能，以至于加在其上的治理任务和问题过载，全球主义治理不堪重负（比如国家治理的失效或失败轻易地外溢到边界之外成为全球治理难题）；或者我们过分低估了全球主义治理的潜力，以至于当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时，对全球主义采取了轻易的放弃或抛弃（如各种“退群”和保护主义政策）。

三 全球主义的反思

如果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问世算起，当代全球主义思潮已经在过去五十年的时间里一路高歌猛进了半个世纪。回望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主义的狂飙突进，正视当前全球主义所面临的低潮与困顿，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全球主义的确走入低潮，但不可否认全球主义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全球主义生发于全球性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在生态退化、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人类的工业化和各种社会活动造成大量环境污染，海洋、极地、太空等全球公域遭受各种人类活动威胁，单个国家或者若干个国家都难以应对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领域，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仍然具有克服主权国家局限、推动国家间合作和动员各种资源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重要作用。在上述各种全球性问题领域，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以及各种国家中心主义的思路不能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出路，全球主义仍然不可替代。

但在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思潮迅猛发展的现实中，全球主义的确在退潮。首先是遍布西方世界的各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泛滥滋长，严重冲击和挤压了全球主义的思想地盘和政治空间。其次是经济全球化遭到了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不少社会群体的各种质疑和抵制，经济全球化给部分发达国家内部带来了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和税收减少等负面影响，不少社会阶层由此面临各种收益和福利受损的压力，由此产生了各种反全球化呼声。这种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抵抗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人们对全球主义

的看法和立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去全球化政策,各种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大行其道,全球主义在政策层面遭受巨大挫折。全球主义的发展确实进入低潮。

但是我们绝不应该由此否认全球主义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全球主义的价值内核是人类整体利益观和人类安全中心观,其核心使命是在人类面对共同威胁的全球性问题领域指引人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①在这些领域,单个国家或部分国家难以克服自身局限,也难以独自解决和应对这些难题。即使全球主义因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我们也不应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弊端归咎于全球主义。客观地说,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经济规模得到急剧扩大,全世界人民总体上受益巨大,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的受益更是远超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问题的核心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分配不均,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急剧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鸿沟。在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收益更多地集中在了资本拥有者手中,中等收入者在就业机会、福利收益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成为全球化的“被剥夺者”。^②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贫富悬殊和分配政策问题远比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更多、更为严重,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所面临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严重误读。^③事实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成果的“蛋糕做大”与如何

① 在全球性色彩更为凸显的全球公域问题如海洋、极地和太空等领域,人类共同利益的需求在几个世纪的治理发展中已经“内嵌”其中,甚至已经成为国家落实全球治理行动的方案之一。参见陈秋丰:《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

② 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482页。

③ 美国研究者布瑞默(Ian Bremmer)在其著作《我们 vs. 他们:全球主义的失败》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是带来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安全,但是美国在2006—2013年制造业消失的工作机会有88%不是被全球贸易而是被技术进步特别是机器人给夺走的。而在服务行业,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后将会有77%的餐饮服务岗位、2/3的金融保险职位和超过一半的零售行业岗位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消失。中产阶层的这种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也正好与全球主义日渐盛行的进程相合拍,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主义开始流行以来的四十多年历史中,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62%,但是到2014年这一比例则下降到了仅占43%,美国家庭拥有财富的中位数在2001—2013年下降了28%,工厂制造业工人岗位在过去四十年里消失了接近40%。于是,这些全球主义的失败者出于安全的本能去寻找自己的“敌人”,贸易、资本、移民等最可能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占领华尔街,反全球主义,仇视移民和排外,甚至喊出了“让美国重新变白”(MAKE AMERICA WHITE AGAIN!),他们不需要了解真相,他们只需要敌人。参见 Ian Bremmer, *Us vs. Them: The Failure of Globalism*, Portfolio, 2018, pp. 1—6, 7—34, 161—168。

更加公平分配之间寻找到一种更加平衡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去全球化将导致世界经济走向封闭和萎缩，经济发展的“蛋糕缩小”同样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既不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部问题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回避寻找解决真正问题的挡箭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该收起各种去全球化的拙劣政策，与世界各国团结一道，共同推进和改善经济全球化，共同把世界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这才是解决问题唯一的康庄大道。

第二，全球主义占有道德制高点的议题领域，人类如何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审慎。

当代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主要产生于人类社会对自身所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觉醒，这种政治觉醒激发了人类社会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强烈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进而使得全球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制高点。但是，在人类社会将这种具有道义制高点的全球主义意识付诸治理实践时，道义理想所缠缚的炽热情感与全球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就构成了对人类理性认知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挑战中，人类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理性来对宏大的社会工程所包含的巨大道德风险和治理风险保持足够的审慎。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中，一群怀有强烈使命感的科学家们运用复杂的动态系统模型得出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生态系统反馈循环已经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已受到严重破坏，若继续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人类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只需百年或更短时间就将达到极限，届时地球资源将会迅速地被指数级增长的庞大人口所耗尽，并最终导致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的崩溃。在这个振聋发聩的警告中，报告提出了对人口和经济增长施加控制的建议，甚至其主要代表人物在后来进一步提出经济零增长和人口零增长的强制性控制目标。^①今天重新解读《增长的极限》，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是在以某种控制论的偏好倡导宏大的人类社会工程，这种宏大的人类社会工程，特别是对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的强制性控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未来风险全知全能的判断之上，忽视了全球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所具有的潜在风险。

^①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第167—168页。

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主义狂飙突进时代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施加控制的雄心和近新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强制性碳减排工程和应对疫情的强制性社会控制工程,如何汲取历史教训和保持足够的审慎与理性以及对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敬畏,是每一位“地球公民”都值得思考的大问题。^①

第三,全球主义的“西方之思”及其超越。

当代全球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之初,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罗马俱乐部报告为基础的全球主义思潮突出强调了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与人口指数级增长这两大核心指标,控制这两大指标成为全球主义思潮的核心主张。但是我们又观察到,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已经完全进入了发达状态,并开始了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步伐。一方面它们对资源的占有和消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规模;另一方面,其人口增长速度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趋缓。这种人口与资源紧张关系开始迎来转机的时刻,为什么却触发了西方知识精英前所未有的焦虑呢?答案不在“全球西方”,而是在“全球南方”。

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南方”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亚非拉南方民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运动中纷纷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落后殖民地国家经过反殖民斗争和“不结盟运动”等政治洗礼,到70年代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南方”。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为“全球南方”迎来了和平发展和人口暴增的新景观,并且他们以新的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发起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全球南方”的兴起,其人口“爆炸性”增长,对工业化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迫切追求,这一切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忧虑。按照西方世界精英们的考虑,如果“全球南方”都像西方国家那样最终走向发达,非西方世界的人口增长及其对地球资源的庞大需求,必将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和地球系统的崩溃。而现实中的情景却是,《增长的极限》中的人口指数级增长在“全球南方”,对地球资源的庞大消耗在“全球西

^① 即使不考虑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仅观察目之所及的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病的全球性危机及其强制性应对措施所产生的次级冲击效应和系统性效应,我们也应该对各种全球性危机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保持足够的审慎和理性。关于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措施所产生的系统性效应,请参见刘贞晔:《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方”！控制工业化和保护环境是西方世界的后工业化需求，控制“全球南方”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也是西方的后工业化需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世界成了最大赢家，原来的战略竞争对手已不存在，将苏联东欧国家和“全球南方”纳入自身掌控的全球秩序，成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主要战略考量。于是全球主义就成了可以借用的载体，全球主义迅速地从一种全球意识演变成全球主义的治理实践，美国借助全球主义的大潮再次走向了新的霸权顶峰，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迅速地扩展了其全球优势，同时也把其控制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展至全球所有地区。由此，全球主义秩序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诉求。

历史进入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主导地位走向衰落，全球主义也在走向退缩，与之相伴随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世界开放经济体系也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在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退潮”之后，崛起的新兴国家能否为全球主义带来新的政治经济动力和价值，以超越长期以来全球主义所内嵌的“西方之思”？^① 这考验着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生命力和未来发展的前途。^②

第四，在国家主义日益勃兴的时代，全球主义如何与国家主义相调适？

政治经济学里有一个说法是每隔20年左右，全球经济领域就会出现一股反国家主义的思潮，但是这次反国家主义的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了一个超长周期，市场自由主义支配了这个周期长达40年之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掀起的“退群”潮以来，全球政治经济长周期似乎是进入了国家主义的长周期。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强势推出“再工业化”和让制造业重回美国的一系列政府刺激和干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推出了预算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1.9万亿美元的美国纾困计划（The American Rescue Plan）和超过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被认为

① 张胜军教授认为新兴国家崛起中呈现的“活力国家”以及来自东方文化经验和金砖治理实践等构成的“东南主义”有望从西方手中接过全球治理主导权，为变革和重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范式。参见张胜军：《全球治理的“东南主义”新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

② 如果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上所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或者说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事实上是一种整体性治理的逻辑，主要新兴大国能够在国家治理层面实施一种国家主导和管控强度较高的市场政策的同时，而在全球层面倡导和创建一种开放度高和自由度大的市场政策吗？而且这两种不同的政策能够整合为一种统一的秩序价值吗？关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是一种整体性治理的观点，也可参见刘贞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里根政府制定的市场自由主义政策的重大转变,是国家干预主义相隔四十年之后的重新回归。在国际经贸政策上,加征关税、加强跨国企业所得税征收、强力干预跨国收购和投资、在科技领域构筑“小院高墙”的管控壁垒等,也都反映了国家干预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在部分新兴大国,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色彩也十分突出,国家对产业政策高度倚重,有管控的市场常常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立场。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WTO上诉争端机制陷于停摆意味着世界各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又少了一项重要约束,G20宏观政策协调在具有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功用的同时也意味着主要经济体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具有联合施以重拳的途径。就政治层面而言,大国竞争加剧、国家主导型经济在竞争中的优势、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干预,以及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回归等,都凸显了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中正在扮演更为突出的角色。^①

如果国家主义的回归在未来的几十年成为可能的话,未来的全球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还是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治理实践,其如何与国家主义相调适?这是全球主义未来能否持续存在并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②

① 田野、卢孜:《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性:延续还是变革》,《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作者对上述五大因素作用下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从来都不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国家一直是其中的核心行为体,只是在上述五大因素的作用下,国家在今天的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更加鲜明和突出。从作者的研究结论中可以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国家角色作用的突出和强化会不会与过去四十多年来全球经济秩序中包含的全球主义价值存在巨大的张力?如果这种张力持续增大的话,会不会最终导致现有秩序价值的转换?

② 蔡拓教授在探究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时提出了二者相调适的著名原则——“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原则,并从哲学高度对二者间的调适做了系统阐述,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将这些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经济领域以及如何处理二者间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指明了在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勃兴时代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主义的问题,如今在国家主义强势回潮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全球主义同样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蔡拓:《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0期。